

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相關性之 三層級後設分析

張晨光¹、黃宗堅²、劉書瑜²

為更系統化瞭解並釐清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國知網數據庫」、Pubmed、Wiley、ProQuest、EBSCO、PsycARTICLES 等中英文資料庫檢索同時測量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研究，共納入 51 篇中英文期刊論文與碩博士學位論文、230 個效果量，涉及研究參與者 15,614 名。本研究突破過去統計方法之限制，改採三層級後設分析模式進行資料分析，結果發現：（1）親職化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之間存在顯著性正相關。（2）來自於東方文化的研究所發現之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顯著低於來自於西方文化的研究。（3）親職化中「不公平感」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顯著高於其他類型親職化。（4）親職化與內化問題的相關係數，顯著高於其與外化問題行為的相關係數。（5）其他變項（如研究對象性別、年齡段、親職化測量工具、出版年份、出版狀態等）均未見顯著性調節效果。作為第一篇納入華人親職化研究的三層級後設分析，本研究結果提示實徵研究與實務工作者應特別關注「不公平感」與「文化脈絡」在親職化發生歷程中的獨特效應，避免對親職化「過度病理化」假設。最後，針對親職化現象在實務應用與未來研究方向，提出討論與建議。

關鍵詞：親職化、心理健康、三層級後設分析、調節效果

¹ 西南民族大學教育學與心理學學院

¹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通訊作者：黃宗堅，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tchuang@cc.ncue.edu.tw。

本研究感謝西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編號：2022SJX001）；作者亦感謝匿名評審委員所提供之寶貴審查意見與建議。

「童年原是一生最美妙的階段，那時的孩子是一朵花，也是一顆果子。」法國作家巴爾札克（Honoré Balzac）的這句話道出了歐美主流文化對於童年的期待：兒童本應該在安全的照料和保護環境中長大，以利於他們可以順利從幼年發展到成年。然而不幸的是，有些家庭卻可能因為家境貧困、移民、夫妻衝突、父母忙於生計、罹患重大身心疾病、監所服刑等情形，使得父母難以扮演好其應有的親職照顧角色，不能為孩子提供舒適的養育環境。於是，這些陷入「家庭困境／逆境」的孩子，開始承擔起本應該父母承擔的責任以維持家庭穩定。這種家庭內出現的親代與子代角色翻轉的現象，被稱為「親職化」（parentification）（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而具此現象的兒童則被稱為「親職化兒童」（parentified children）（Louise & Cushway, 2002）或「兒少照顧者」（young carer）。

在父母失功能或功能不彰的家庭脈絡下，親代與子代的角色有可能被翻轉，由孩子來承擔本不屬於其角色責任的工具性或情感性照顧活動；或者未成年子女被迫捲入父母的夫妻次系統，親子代間的界限被衝破，形成「三角關係」（triangulation）以緩和父母緊張的婚姻關係（Bowen, 1976）。在這樣糾纏的親子關係或高強度生活壓力之下，兒童的基本發展需求常常被忽略。長此以往，親職化兒童會內化親職化角色而延宕自我分化，往往對長期心理發展產生不適應的影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親職化現象也可能普遍出現於健康家庭之中，不能被無條件地歸類於心理病理領域（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即便是功能正常的父母，由於工作、家庭或者照顧多名子女的壓力，也難保不會在維持與照顧家庭時力有未逮。此時，作為在家庭系統之中與父母緊密互動的未成年子女，自然萌生出輔助或替代父母角色的想法，進而付諸行動去照顧父母或者手足（張晨光、劉經偉，2020）。這種親職化行為非但不是病理性的，反而可以緩解家庭壓力、維持家庭穩定。親職化兒童在照顧者角色中所經驗到的勝任感（Byng-Hall, 2008），會提供一種機會讓兒童、青少年經驗到個體化與重要性的感覺（Chase, 1999），從而緩衝親職化對於兒童、青少年心理發展的負向影響。因此，在很多相關研究證實親職化對兒童、青少年，乃至於成人心理健康具有負向影響（Nuttall et al., 2019）的同時，也有一些研究發現親職化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並無顯著關係（許惠雯，2007；Hamin, 2006），甚至是具有正向影響的可能（李方敏，2021；張虹雯、郭麗安，2000）。

針對上述親職化與心理健康實證研究結果的不一致，Hooper、Decoster 等人（2011）首次對親職化進行後設分析，結果發現：自我報告的童年親職化（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與成年後心理病理結果（包括憂鬱、物質使用、焦慮、PTSD、人格障礙、進食障礙等）之間存在顯著性的正相關，但其相關係數處於低等水準（ $r = .14$ ）。雖然該研究採用各種方法盡力蒐集之前近 40 年（文獻年份從 1984 年到 2010 年）的相關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僅在後設分析中納入 12 個實證研究與 12 個後設分析效果量；在其納入分析的調節變項中，親職化類型只劃分為兩種類別（情感性親職化與未區分親職化），研究參與者種族也只包括「白人美國人」與「黑人美國人」兩種。不過近十年來，相關領域的學者大力拓展了親職化類型、測量工具與研究對象。尤其是，自張虹雯與郭麗安（2000）在華人文化脈絡下，首次以「親子三角關係」的理論視框檢視親職化與兒童行為問題的研究以來，親職化相關的各類中文研究文獻也累積有數十篇之多。可惜的是，目前既未有後設分析針對兒童、青少年親職化的即時效果（即兒童、青少年親職化與其即時心理健康的關係）進行探究，亦未納入華人文化脈絡下親職化研究的後設分析報告發表。

有鑑於此，本研究同時蒐集英文與中文文獻，納入以兒童、青少年、成人為對象的實證研究，選擇採用三層級後設分析模式（three-level meta-analytic model），更為全面性地檢視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係，並試圖找出影響二者關聯程度的調節變項，希冀能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的關係獲得更進一步的釐清之外，且提供更為嶄新且系統化的證據，以利該領域研究者與實踐者之後續理論建構與臨床處遇工作之參考。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 （一）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整體關係為何？
- （二）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是否存在層級 2（研究內）與層級 3（研究間）的異質性？
- （三）若相關係數存在異質性，影響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聯的調節變項為何？
 1. 研究對象特徵（性別、年齡段、家庭脈絡、文化脈絡）調節變項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聯的影響為何？
 2. 親職化特徵（測量工具、類型）調節變項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聯的影響為何？

3. 心理健康結果類別（內化問題、外化問題等）調節變項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聯的影響為何？
4. 出版特徵（是否出版、出版年份）調節變項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聯的影響為何？

文獻探討

（一）親職化

家族治療學者 Minuchin 等人（1967）在對貧民區家庭進行觀察時，曾使用「親職化小孩」（parental child）一詞指稱那些由於經濟或社會條件問題而在家裡承擔父母責任的兒童。之後，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1973）正式提出「親職化」概念，意指「一種主觀扭曲的關係，個體在這種關係中期待伴侶甚至是孩子充當自己的父母」。在這樣的家庭中，父母有意無意地創造一種環境促發子女的照顧行為，以維持家庭的動態平衡。其實，這種現象之前就曾經被 Morris 與 Gould（1963）界定為「角色翻轉」（role reversal），用以描述父母將親子角色功能翻轉過來，反而將子女充當為一種關鍵、有力量的父母角色。與親職化相關的專業術語還有「角色混淆」（role confusion）（Macfie et al., 2015）、「代際間的界限消融」（generational boundary dissolution）（Nuttall & Valentino, 2016）或「界限扭曲」（boundary distortion）、「子代責任」（filial responsibility）（Jurkovic & Thirkield, 1999）等。從上述的說明中，我們不難發現親職化的相關術語及命名並不一致，例如，「界限消融／扭曲」更像是對家庭結構的描述，而「子代責任」又容易與「孝道」（filial piety）相混淆，本文參照張晨光與劉經偉（2020）的觀點而繼續使用「親職化」一詞。

（二）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聯

長久以來，親職化被視為一種威脅個體童年乃至成年後心理發展的危險性因素，有關親職化的實證研究也多聚焦於親職化的不利後果（adverse consequences）（Hooper, Decoster, et al., 2011; Macfie et al., 2015）。在親職化的家庭脈絡中，父母難以有意識地、理智地顧及未成年子女的需求，反而要求孩子更多地去考慮如何滿足父母的需求（Kerig, 2005）。因此，兒童在理應得到照顧的年齡無法得到較好的照顧與滋養，而且這種跨越親代界限的親職化行為又使得親子次系統過於糾結而無法適當地分化。這不但致使兒童感到負擔過重和疲憊不堪（Chen & Panebianco, 2020），表現出攻擊、違紀等外化行為問題（Shortt et al., 2010）或者焦慮、憂鬱等內化問題（Schier et al., 2015; Williams & Francis, 2010）；甚至對成年後的學業成就（Chase et al., 1998）、心理疾病（包括憂鬱、物質成癮、焦慮、PTSD、人格障礙、進食障礙等）（Hooper, Decoster, et al., 2011）、自我能力否定傾向（Castro et al., 2004）產生顯著的影響。此外，這些親職化兒童在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後還可能「重蹈覆轍」，呈現親職化世代傳遞的特徵（Schwartz-Stav, 2019）。

另一方面，實證研究亦發現親職化並不必然給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帶來負向的影響。其中，對兒童（如，五六年級小學生）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親職化與內、外化行為問題反而存在顯著性的負相關（李方敏，2021；張虹雯、郭麗安，2000），或與其內化問題無顯著性相關（許惠雯，2007；Hamin, 2006）。對青少年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比如青少年親職化與其心理健康（楊陽，2011）、憂鬱（王趙娜、王美萍，2014）、行為問題（郭笑笑等人，2021）存在顯著性負相關，或與其物質使用無顯著性相關（Kam, 2011）。上述結果均顯示，兒童、青少年的親職化也有可能緩解其負向心理健康症狀的出現，或與其心理健康負向結果不存在統計意義的關聯性。

對於上述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有一部分研究之解釋是，來自華人文化脈絡下的研究者將其歸因為文化脈絡影響，認為研究對象受儒家思想影響，而將維持父母間的和諧關係視作自身的責任，承擔親職化角色會讓自己更有價值，從而減少其憂鬱情緒（王趙娜、王美萍，2014），或因自尊提升而減少外化問題行為（張虹雯、郭麗安，2000）。同時有研究者歸因於親職化的類型，主張工具性親職化更有利於增強孩子的自信和責任感，促使他們積極應對壓力事件，因而較少表現出外化問題行為（郭笑笑等人，2021）。此外，也有學者認為研究對象的家庭脈絡（如，父母衝突、家庭暴力等），可更清楚預測親職化與內外化問題的關聯性（郭笑笑等人，2021；Hamin, 2006）。不過這些推論僅來源於個別實證研究，其證據說服力有限，均有待後設分析提供更進一步的實證支持。

(三) 親職化影響的相關因素探討 (調節變項選擇的合理性)

誠如以上所述，諸如文化脈絡、親職化類型、研究對象的家庭脈絡等均有可能是導致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所在。關於親職化的綜論性文章也提及，人口學變項（如性別、種族等）、親職化測量工具與類型、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等因素對兒童、青少年親職化的發生歷程與心理結果等產生影響（Burton, 2007; Chase, 1999; East, 2010; McMahon & Luthar, 2007）。茲分述如下：

1. 人口學變項

人口學變項最常被納入到後設分析的調節效果檢定之中，前述 Hooper、Decoster 等人（2011）對童年親職化進行的後設分析就涉及到性別、家庭脈絡、文化脈絡等潛在調節變項。

(1) 性別。早期的親職化理論假設女性會比男性在童年承擔更多的親職化責任，也容易經驗到親職化的有害結果（Chase, 1999; Jurkovic, 1997）；但也有其他研究發現，男性會經驗到更為有害的親職化後果（Diaz et al., 2007）。然而，後續的實證研究卻沒有提供持續的支持證據。Kuperminc 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性別與親職化的心理後果並無顯著性關聯；Hooper、Decoster 等人（2011）的後設分析雖然也未發現性別在童年親職化與成年心理病理結果之間的顯著性調節效果，但性別可能帶來的影響在這十年中是否有所變化，的確也值得進一步探究。

(2) 家庭脈絡。父母或手足長期的身心疾病、移民家庭是過往親職化理論與實證研究著力較多的家庭危險因素（Williams, 2015）。家庭中父母手足身心疾病，或者移民家庭所遭遇的語言障礙、失業、家庭成員的分離等問題（Jurkovic et al., 2004），都有可能使得兒童、青少年主動或被動地承擔起更多的家庭成員照顧任務（Oznobishin & Kurman, 2009; Stein et al., 1999），從而增加兒童、青少年的親職化程度。雖然有研究對母親患有精神疾患的大學生進行研究後指出，其童年親職化與成年心理健康負向症狀都顯著高於母親沒有精神疾患的大學生，而且前者親職化（角色翻轉）與心理健康的相關係數高於後者（Abraham, 2010）。不過，這種同時納入臨床與非臨床脈絡下樣本的研究，卻難以對兩種樣本中的相關係數差異進行統計考驗。隨著在常規（非臨床）脈絡樣本中進行的親職化實證研究不斷積累，的確有必要將「家庭脈絡」作為後設分析的調節變項，探索臨床樣本與常規樣本中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的關聯性差異。

(3) 文化脈絡。種族文化的影響，是近些年親職化研究學者相當關注的焦點。Hooper、Decoster 等人（2011）的後設分析結果顯示，在那些非裔美國人相較歐裔美國人所佔比例更高的研究樣本中，親職化與心理病理結果的關聯程度更高。而來自於拉美文化（Jurkovic et al., 2004）與土耳其文化（Zencir & Haskan-Avcı, 2019）的學者則指出，兩種文化都將兒童承擔成人責任看作是對需要幫助的父母之正常反應，對其所在家庭有正向意義，並且受到其社會文化的支持。這一點在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響的華人家庭之中似乎更為突出，子女為家庭、手足、父母所做出的照顧、關懷、奉獻、犧牲等行為，常常被視為兒童的孝道實踐而被社會所肯定，進而獲得父母的讚許與家中的地位（張晨光、劉經偉，2020）。於是，文化價值很有可能緩衝親職化的負向影響，乃至於翻轉親職化的影響。近十年來各種文化脈絡下的親職化研究不斷增加，尤其是華人文化脈絡下的研究已經有所積累，很有必要通過後設分析，針對較為典型的東西方文化脈絡中的親職化影響進行比較。

2. 親職化測量工具與類型

親職化的實證研究中，使用較為廣泛的親職化測量工具有「親職化調查表」（Par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PQ）（Jurkovic & Thirkield, 1998）、「子代責任量表」（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 FRS）（Jurkovic & Thirkield, 1999）、「親職化問卷」（Parentification Inventory, PI）（Hooper, Doehler, et al., 2011）等。其中，FRS 是由 PQ 更名而來，量表的結構與題項基本一致。整體而言，上述量表分別從兩個向度評估親職化的程度——親職化行為與親職化感受。

(1) 親職化行為。PQ 與 FRS 將親職化行為進一步劃分為「工具性親職化」（instrumental parentification）與「情感性親職化」（emotional parentification）。這種分類方法肇始於 Minuchin 等

人(1967)的親職化理論,在親職化研究領域被學者們廣泛接受。其中,工具性親職化是指兒童以行為的方式滿足家庭系統中的需求,常見的責任有照料手足、準備飯菜、處理財務、完成家務、跑腿等;情感性親職化,意指兒童在家庭系統之中扮演知己、關係調停人等角色,關照父母或手足的情緒問題(Jurkovic, 1997)。雖然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兒童都是同時承擔情感性與工具性兩種親職化責任,但工具性親職化對兒童而言更容易適應,而情感性親職化卻會帶來更多的壓力(Byng-Hall, 2008)。因此,就長遠影響而言,情感性親職化對孩子的幸福感和心理發展也更具威脅性(Chase, 1999),例如,一項對大學生的實證研究發現,其童年的情感性親職化與憂鬱和焦慮症狀顯著性正向關聯,而工具性親職化則無此關聯(Hooper & Wallace, 2010)。陳慧珊與吳麗娟(2013)對臺灣大學生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亦即高情感性親職化與較差身心健康狀況之間的顯著性關聯,而不論個體「工具性親職化」的多寡。其他相關研究亦發現,情感性親職化與子女的負向心理適應結果相關,而工具性親職化則與正向心理適應結果相關(Khafi et al., 2014)。

此外,在Mika等人(1987)對親職化角色行為分類的基礎上,Hooper、Doehler等人(2011)所編制的「親職化問卷」(PI)則依據親職化行為所付出的對象劃分為「聚焦父母的親職化」與「聚焦手足的親職化」。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親職化的付出對象,是針對母親、父親還是手足,亦或者整個家庭,也會影響子女所承擔親職化的具體責任,進而對孩子的心理發展帶來不同的影響(Schier et al, 2015)。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聚焦父母的親職化與憂鬱症狀、一般心理健康症狀、酒癮症狀等的相關係數均高於聚焦手足的親職化行為(Hooper, Doehler, et al., 2011)。

(2)親職化感受。目前研究中得到較多關注的親職化感受是「感知到的不公平感」(perceived unfairness)——親職化小孩主觀經驗到從自己照料的家人處獲得認可與回報的程度。得益於PQ與FRS的廣泛應用,相關實證研究紛紛發現不公平感對成年後心理健康具有顯著性負向影響(李汶軒, 2013; Cho & Lee, 2019; Hooper et al., 2015; Jankowski & Hooper, 2012; Jankowski et al., 2013)。就預測作用的程度而言,感知到的不公平感對心理困擾的顯著性預測作用要高於工具性與情感性的親職化(Hooper & Wallace, 2010),這一點在Hooper與Doehler(2012)、Thirkield(2001)的研究中也有所體現。

另一方面,為了有別於「不公平感」這種負向感受,Hooper、Doehler等人(2011)在其編制的「親職化問卷」(PI)中另外增加「感知到的獲益感」(perceived benefits)向度,即為一種親職化的正向感受,並進一步採用上述「親職化問卷」(PI)進行的研究發現,如果能在親職化行為中感知獲益感的話,研究參與者的憂鬱、酒精使用行為(Hooper, Decoster, et al., 2011)、暴食行為(Hooper et al., 2012)則會減少;而且這種獲益感與自尊、手足關係(Borchet, Lewandowska-Walter, Połomski, Peplińska, & Hooper, 2020)、正向情感(Burton et al., 2018)存在正向相關。此外,個別親職化測量工具還涉及罪疚感(簡匯育, 2010)、角色滿意感(Borchet, Lewandowska-Walter, Połomski, & Peplińska, 2020)等親職化感受,只是相關實證研究較少,在此並不贅述。

3. 心理健康結果類別變項

從上述說明中,我們不難發現,過往親職化實證研究發現與親職化存在正向關聯的負向/適應不良(maladaptive)心理健康結果眾多,其中涉及憂鬱症狀、焦慮症狀、軀體化、物質使用、內化問題、外化問題以及各類心理障礙等。那麼,親職化對各類心理健康結果的影響究竟是無差異,抑或是與某些特定的心理健康負向結果具有更高的關聯性?這一議題鮮少有理論學者和實證研究者涉及,因此,相當值得我們進一步予以探究。此外,Hooper、Decoster等人(2011)的後設分析發現,成人心理健康結果類別具有顯著性調節效果,其中酒精使用障礙、憂鬱症狀與親職化的相關明顯低於其他心理病理結果,但由於其後設分析效果量數(三個心理健康結果類別均只有1個效果量)對統計分析效力的限制,故研究者並未做詳細的討論。

將心理健康問題劃分為內化問題(發生在心境和情緒上的心理失調,如憂鬱、焦慮等)與外化問題(表現在外部行為方面的症狀,如攻擊、成癮等)的做法,在當前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測量與實務工作中被廣泛接受(Achenbach et al., 2016)。那麼,將不同心理健康結果分類為內化、外化問題,應可以對親職化影響的差異性予以更系統性地探索。如前所述,糾纏的親子關係或高強度生活壓力之下的親職化小孩,因無法得到較好的照顧與滋養,而可能經驗到較多的憂鬱、焦慮等內化

情緒問題；同時，他們成功應對親職化任務的經驗也可能增強其內部控制感（Williams & Francis, 2010）與同理心覺知能力（van der Mijl & Vingerhoets, 2017）。相關研究亦發現，青少年的控制感（Vazsonyi et al., 2017）、同理心（Miller & Eisenberg, 1988）均與外化問題（如攻擊）具有負向關聯。這是否意味著親職化與內化問題的關聯程度會顯著高於外化問題？十餘年以來，親職化相關研究的數量明顯增多，實證研究所涉及的心理健康結果的類別不斷增加，更有不少實證研究中同時分析親職化與不同心理健康結果的關係。為了將研究中分屬於內／外化問題的各類心理健康結果同時納入分析，有必要採用更為系統的統計方法（如，三層級後設分析）進行後設分析，以期對親職化與內／外化心理健康問題關聯性的差異進行統計考驗。

回應上述文獻探討中提到的影響因素，本研究擬納入人口學變項（樣本特徵）、親職化測量工具與類型（親職化特徵）、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等變項進行三層級後設分析與調節效果分析。為更多地探索有可能影響親職化與心理健康關係、導致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因素，亦將出版與否、出版年份等納入後設分析的調節效果檢定之中。

方法

本研究以 Moher 等人（2009）所提出的 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聲明做為研究的項目性指標之依據，參照陳景花與余民寧（2019）所使用之後設分析程序，採用 Assink 與 Wibbelink（2016）編寫的三層級後設分析模式統計方法，以統計軟體 R4.1.1 版本的 metafor 包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聯進行後設分析。具體而言，三層級後設分析可以將效果量的變異來源分為抽樣變異（層級 1）、研究內變異（層級 2）與研究間變異（層級 3），分別對其異質性與調節效果進行計考驗和分析。目前，本研究已經於 PROSPERO（international prospective register of systematic reviews）網站完成研究設計之預註冊（pre-register），註冊 ID 為 CRD42021253195。

（一）資料選定準則

1. 研究資料：公開發行的期刊論文或未經公開發行的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中文或英文書寫。
2. 研究時間：截止 2021 年 12 月。
3. 研究主題：探索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聯。
4. 研究對象：經驗親職化之兒童、青少年以及曾有童年親職化經驗之成年人，包括臨床（如，父母精神疾患、慢性身體疾病、手足罹患自閉症、低社經地位等）、移民、非臨床的常規樣本。
5. 研究方法：調查性研究，包括橫斷與縱向追蹤研究。由於考慮到他評測量方式難以評估親職化感受，因此要求納入研究必須以自評的方式測量研究參與者的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排除他評測量、樣本量低於 50 的量化研究、行動研究、個案報告或其他質性研究、理論綜述類研究等。
6. 研究變項：同時包括親職化相關變項（如，親職化、角色翻轉、子代責任、照顧行為等）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相關變項（如，憂鬱、焦慮、軀體化、物質使用、心理健康總體狀況、內化問題行為、外化問題行為、問題行為總分等）。
7. 研究結果：提供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的相關係數（皮爾遜積差相關係數 r ）或能轉換為積差相關係數的其他統計值（ F 值、 t 值或 χ^2 值等），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多重回歸分析的 β 係數等統計資料被排除在外。

（二）資料蒐集

文獻檢索的中文資料庫包括「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國知網數據庫」與「中國優秀碩博士論文數據庫」等，英文資料庫包括 Pubmed、Wiley Online Library、ProQuest（包括 APA PsycInfo, Education Database, Psychology Database, PTSDpubs, Dissertations & Theses A&I/Global 等 5 個資料庫）、EBSCO（Academic Search Complete）、PsycARTICLES 等。文獻蒐集過程於 2021 年 12 月 24 日截止，檢索條件為：在標題或摘要中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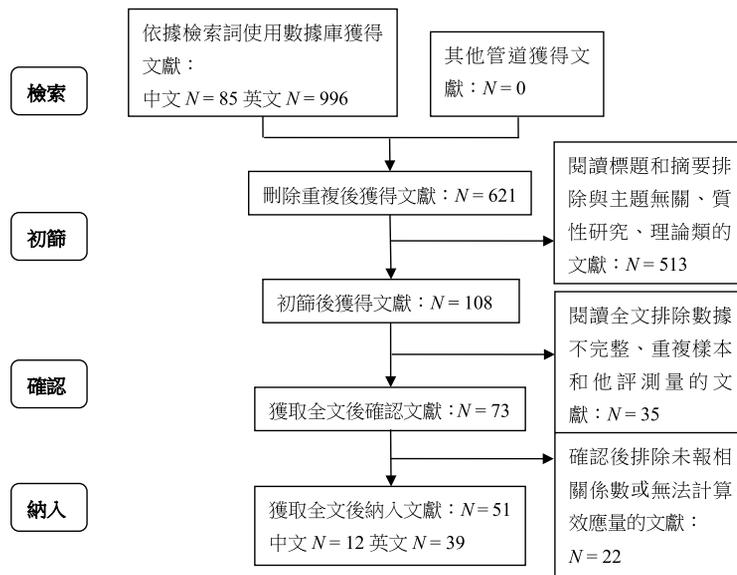
包含兩個面向（親職化、心理健康結果）中至少一個關鍵字（見表 1）。參照 Hooper、Decoster 等人（2011）後設分析的做法，為盡可能多地納入與親職化有關的實證研究，本研究亦將與親職化內涵相同或相似的概念加入檢索關鍵字之中，具體如表 1 所示。

表 1
兩個檢索向度的關鍵字

檢索面向	中文關鍵字	英文關鍵字
親職化	親職化、親子三角關係、家庭三角關係、兒少照顧者、親子界限、親子邊界	parentif* or role reversal or role confusion or boundary dissolution or boundary distortion or boundary problems or young care* or filial responsibilit*
心理健康結果	心理健康、憂鬱、焦慮、軀體化、內化問題、外化問題、困擾	mental health or internaliz* or externaliz* or depressi* or anxi* or somatization or distress

本研究資料蒐集流程如下圖 1 所示。資料檢索階段共獲得文獻 1,081 篇，其中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22 篇、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38 篇、中國知網數據庫與中國優秀碩博士論文數據庫 25 篇；歐美期刊、學位論文資料庫 ProQuest 共 423 篇、Pubmed 共 153 篇、Wiley Online Library 共 40 篇、EBSCO 共 301 篇、PsycARTICLES 共 64 篇。刪除重複研究後獲得文獻 621 篇；再根據每一篇論文的標題、摘要內容進行初步判讀，刪除與主題無關（409 篇）、理論性文章（28 篇）、質性研究（76 篇）的文獻合計 513 篇。最後通過閱讀全文，排除重複樣本（3 篇）、統計數據不完整（24 篇）、他評測量（8 篇）、統計結果無法轉換為積差相關係數的研究（22 篇）合計 57 篇。據此，符合資料選擇準則的中文研究有 12 篇、英文研究有 39 篇，共有 51 篇期刊論文或碩博士論文納入後設分析。

圖 1
後設分析研究資料蒐集流程



(三) 資料登錄及文獻特徵編碼

本研究的資料登錄與編碼主要遵循以下原則：(1) 效果量的產生以獨立樣本為單位，每個獨立樣本僅編碼一次。如果一篇論文同時報告多個獨立樣本，則對應進行多次編碼。(2) 若研究參與者特徵(如男/女)分別報告相關係數，則予以分別登錄。(3) 若研究是縱向/追蹤設計，則僅對在同一研究時間施測之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進行登錄。本研究由兩名編碼者(第一作者與第三作者)分別對納入研究進行獨立編碼，兩名編碼者的一致性為91%。對於兩名編碼者不一致的資料登錄與編碼，經過仔細檢查並與第二/通訊作者討論後最終取得一致，這樣可以排除選擇偏誤對後設分析結果的影響。本研究文獻資料的各類特徵編碼如下：

1. 樣本特徵

主要對四種類型的樣本特徵進行編碼。(1) 首先，研究參與者的性別依據樣本中女性所佔比例(%)進行編碼。(2) 研究參與者的年齡則以研究所報告之樣本年齡分別編碼為「兒童」(12歲以內)、「青少年」(12到18歲)與「成人」(18歲以上)。(3) 若研究參與者的父母或手足患有身心疾患，編碼為「臨床」類別；若研究參與者為移民家庭的兒童、青少年，編碼為「移民」類別；其餘則編碼為「常規」類別。(4) 最後，依據研究所在地之主流文化脈絡進行編碼，其中在歐、美、澳大利亞等地進行的研究編碼為「西方」，在亞洲華人文化脈絡下進行的研究則編碼為「東方」，其餘在以色列、土耳其等地區進行的研究則編碼為「其他」，以期檢定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聯程度，是否受到東西文化差異的影響。

2. 親職化特徵

本研究的親職化特徵編碼分為兩種：親職化類型與親職化測量工具。其中親職化類型主要依據實證研究所測量之親職化向度，將其分別編碼為「情感親職化」、「工具親職化」、「不公平感」、「聚焦父母的親職化」、「聚焦手足的親職化」、「獲益感」、「親職化總分」和「其他」(諸如兒童主導、家庭照料、角色翻轉等無法歸入前述類別的親職化類型)。再者，有關親職化測量工具，則依據研究實際所使用之工具將「親職化調查表」或「子代責任量表」編碼為「PQ/FSR」，將「親職化問卷」編碼為「PI」，將「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Triangle Operation in Parental Quarrels Scale)編碼為「TOPQS」，而編碼為「其他」的類別包括「與父母關係量表」(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Scale)、「親子角色翻轉量表」(Parent-Child Role Reversal Scale)、角色混淆量表(IBQ Role Confusion)等。

3. 心理健康結果類別

從文獻中發現，成人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測量指標有所不同。其中成人心理健康的指標包括憂鬱、焦慮、軀體化、物質使用、心理健康總分等；此外，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指標則常分為內化問題(internalizing problems)、外化問題(externalizing problems)與行為問題總分等。內/外化問題是Achenbach(1966)所提出的一種基於臨床經驗的分類方式，時至今日依舊為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者所普遍接受。內化問題意指問題發生在個體內部，主要是指各種憂鬱、焦慮、軀體化症狀等；外化問題的症狀表現於外在行為，具有攻擊性(如破壞、爭鬥、攻擊他人等)、違紀(如喝酒、違紀、偷竊等)、多動等「控制不足」或「社會化不足」的特點。

在對成人的研究中，亦有學者嘗試使用「內/外化問題」的視框探究其心理健康。考慮到成人的憂鬱、焦慮症狀與兒童、青少年內化問題的內涵相近，一項後設分析將其編碼為成人內化問題(Klassen et al., 2013)，參照此做法，本研究將成人心理健康指標中的憂鬱、焦慮症狀與兒少的內化問題合併編碼為「內化問題」。另一項後設分析則將成人的物質成癮歸於外化問題圖譜之中(Lutz et al., 2021)，鑒於成人心理健康指標中物質使用符合外化問題之「控制不足」的特性，將其與兒少的外化問題合併編碼為「外化問題」。此外，成人心理健康總分則與兒童、青少年行為問題總分合併編碼為「總分」；部分研究的結果變項涉及恐懼症、進食障礙等心理疾病，則編碼為「其他問題」。

4. 出版特徵

出版特徵包括出版狀態與出版年份。出版狀態意指是否發表，已經發表的期刊論文編碼為「發表」，而未發表之學位論文則編碼為「未發表」。有關出版年份，期刊論文使用其實際發表年份，學位論文則以其完成年份編碼。

(四) 效果量的計算

本研究採用皮爾遜積差相關係數作為效果量。在進行後設分析之前將原始相關係數轉換為相應的 Fisher's z 分數，之後再轉換回相關係數 (r)，以便於最終結果的解釋。如果在編碼過程中一些文獻沒有報告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的相關係數，而是報告了 F 值、 t 值或 χ^2 值，則採用相關公式將其轉化為 r 值。本後設分析所納入的多數研究均以正相關代表研究參與者經驗到越高的親職化，其心理健康狀況越不佳。但由於受到親職化／心理健康測量工具計分方式的影響，一些研究則是以負相關代表此意涵。因此，在效果量編碼時將此類研究結果中的負相關係數進行正負校正，以確保正效果量代表親職化越高其心理健康狀況越不佳。此外，「親職化問卷」(PI) 中的「獲益感」向度在研究結果中呈現對研究對象心理健康的正向促進效果，為避免其對後設分析中發表偏誤、調節效果檢定的影響，將此類效果量進行正負轉換。

經最後篩選及確認後，51 個研究被納入到當前後設分析之中，共獲得獨立效果量 230 個。

(五) 數據分析方法與過程

考慮到本研究在納入後設分析的某一個特定研究中提取多個效果量，這與傳統後設分析的模型假設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採用三層級後設分析模式，數據分析主要採用 R 4.4.1 版本的 metafor 包進行，R 運行的語句則參照 Assink 與 Wibbelink (2016) 的教程編寫。首先，利用 Cheung (2014) 的公式估計後設分析中的抽樣變異 (層級 1)；然後進行單側對數似比檢驗 (One tailed log likelihood ratio tests) 以確定研究內變異 (層級 2) 和研究間變異 (層級 3) 是否顯著；之後，進一步進行調節效果檢定以確定異質性的來源。在進行調節效果檢定之前，將連續性變項 (如出版年份、性別比例等) 中心化，並為分類變項 (性別、文化脈絡、親職化類型、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等) 創建二分類或多分類的虛擬變項。此外，採用最大似比 (maximum likelihood) 估計模型參數，利用多項檢定 (omnibus test) 估計後設分析模式的回歸係數，並計算相應的置信區間 (Knapp & Hartung, 2003)。

(六) 出版偏誤檢定

出版偏誤 (publication bias) 是指發表的研究文獻不能系統性地代表該領域已經完成的研究總體的一種偏誤現象 (Kuppens et al., 2013)。若不能通過出版偏誤的檢定，則意味著該後設分析沒有將符合納入準則的研究全部納入分析之中 (Yan et al., 2020)。因此，為避免出版偏誤，本研究首先在資料蒐集時盡力獲取沒有發表的研究文獻，然後採用目前研究中常用的「漏斗圖」(a funnel plot)，通過觀察數據點的分佈是否形成以整體估計的效果量為中心的對稱漏斗形，來判定是否存在出版偏誤 (Borenstein et al., 2009)。若漏斗圖左右分佈不對稱，說明後設分析有可能存在出版偏誤；然而造成漏斗圖不對稱的原因除出版偏誤外，可能還有引用偏誤和重複偏誤等其他因素。此時，研究者採用剪補法 (trim and fill method) 以確定是否真實存在出版偏誤 (Duval & Tweedie, 2000; Nakagawa & Santos, 2012)。若剪補法表明存在缺失值，則進一步採用剪補後輪廓增強漏斗圖 (contour-enhanced funnel plots)，判斷增補的效果量是否分佈在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區域。若增補的效果量分佈在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區域，說明漏斗圖不對稱並非是出版偏誤所導致；反之則表明後設分析的結果存在出版偏誤 (Peters et al., 2008)。

結果

(一) 整體效果評估

本研究採用隨機效果模式 (random-effects model) 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關係的整體效果量進行評估，結果顯示，二者之間存在顯著性正相關 ($r = .144, p < .001$)。整體效果量的異質性分析發現， Q 統計量顯著 ($Q(229) = 3220.403, p < .001$)，納入後設分析的效果量之間存在異質性。進一步採用對數概似比檢定對各層級變異成分的顯著性進行檢定。限制研究內變異 ($\chi^2(1) = 742.036, p < .001$) 與研究間變異 ($\chi^2(1) = 85.517, p < .001$) 為 0 之後，分別與三層級模型進行擬合比較，結果顯示限制模型的擬合度均顯著低於三層級模型，這表示效果量的變異在層級 2 與層級 3 均顯著存在。就整體的效果量變異而言，隨機取樣變異 (層級 1) 佔 7.4%，研究內的效果量變異 (層級 2) 佔 34.5%，而研究間效果量變異 (層級 3) 佔 58.1%。考慮到研究內變異 (層級 2) 與研究間變異 (層級 3) 均存在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 ($p < .001$)，而且層級 1 所佔總變異的比例小於 75%，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分析調節變項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係的影響。

表 2
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係整體效應值結果

<i>k</i>	Fisher's <i>z</i> (<i>SE</i>)	95% CI	<i>t</i>	<i>df</i>	<i>r</i>	層級 1 (%)	層級 2 變異	層級 3 變異
							層級 2 (%)	層級 3 (%)
230	.145 (0.026)	0.094–0.197	5.662***	229	.144	7.381	.016*** 34.538	.027*** 58.081

註：*k* 為效果量數；*SE* 為標準誤差；層級 1 (%) 為層級 1 佔總變異數的百分比；層級 2 (%) 為層級 2 佔總變異數的百分比；層級 3 (%) 為層級 3 佔總變異數的百分比；層級 2 變異為研究內變異；層級 3 變異為研究間變異。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 調節變項分析

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係的潛在調節變項檢定結果顯示，文化脈絡、親職化類型、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等變項具有顯著性的調節效果；而性別、年齡段、親職化測量工具、出版年份、出版狀態等變項則不具顯著性調節效果。具體結果如表 3、表 4、表 5 與表 6 所示。

1. 樣本特徵

如前述，本研究「樣本特徵」潛在調節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段」、「家庭脈絡」、「文化脈絡」等。統計結果顯示，研究對象所處之「家庭脈絡」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係中的調節效果處於臨界顯著的狀態 ($F(2, 227) = 2.604, p = .076$)。具體來講，來自於臨床脈絡 (即家中父母或手足患有長期、慢性身心疾病) 中的研究對象，其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 ($r = .229$) 明顯地高於來自於常規家庭脈絡 ($r = .104$) 的研究對象。此外，研究所在之「文化脈絡」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係中亦有顯著的調節效果 ($F(2, 227) = 9.494, p < .001$)。具體來講，來自於東方文化的研究所發現之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 ($r = -.048$) 顯著地低於西方的研究 ($r = .192$)。此外，統計分析並未發現性別、年齡段等變項的顯著性調節效果 (性別： $F(1, 107) = 0.234, p = .629$ ；年齡段： $F(1, 102) = 1.048, p = .352$)。

表 3
樣本特徵各變項的潛在調節效果檢定結果

調節變項	<i>k</i>	Intercept/mean <i>z</i> [95% CI]	β [95% CI]	<i>F</i> (<i>df</i> ₁ , <i>df</i> ₂) ^a	<i>p</i> ^b	Mean <i>r</i>
性別	230	.145***[-0.094, 0.197]	.000 [-0.205, -0.205]	0.000 (1, 228)	.997	—
年齡段						
兒童	20	.097 [-0.014, 0.207]		1.048 (2, 227)	.352	.097
青少年	100	.131***[-0.055, 0.207]	.034 [-0.100, -0.169]			.130
成人	110	.194***[-0.106, 0.282]	.098 [-0.044, -0.239]			.192
家庭脈絡						
常規	151	.104** [-0.041, 0.167]		2.604 (2, 227)	.076	.104
臨床	56	.233***[-0.137, 0.330]	.130* [-0.016, -0.243]			.229
移民	23	.170* [-0.023, 0.317]	.067 [-0.093, -0.226]			.168
文化脈絡						
西方	180	.194***[-0.143, 0.245]		9.494 (2, 227)	< .001	.192
東方	46	-.048 [-0.146, 0.049]	-.243***[-0.353, -0.133]			-.048
其他	4	.180 [-0.069, 0.428]	-.014 [-0.268, -0.239]			.178

註：*k* 為效果量數；mean *z* 是效果量（Fisher's *z*）；CI 是置信區間； β 為估計回歸係數；*r* 為平均的積差相關數。

^a 模式中回歸係數 β 均採用多項檢定。

^b *p* 是多項檢定的值。

* $p < .05$. ** $p < .01$. *** $p < .001$.

2. 親職化特徵

如表 4，統計結果顯示：親職化的測量工具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的關係中不具有顯著性的調節效果（ $F(3, 226) = 1.609, p = .188$ ）；而親職化類型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的關係中，則具有顯著性的調節效果（ $F(7, 222) = 5.120, p < .001$ ）。就親職化類型具體而言，不公平感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 $r = .279$ ）顯著地高於其他親職化類型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 $r = .067-.150$ ）。

3. 心理健康結果類別

統計結果如表 5 顯示，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的潛在調節效果顯著（ $F(3, 226) = 3.419, p = .018$ ）。其中，親職化與內化問題的相關係數（ $r = .177$ ）顯著地高於其與外化問題的相關係數（ $r = .085$ ），親職化與其他心理健康結果類別（如總分、其他問題等）的相關係數未見其與內化問題相關係數的顯著性差異。

表 4
親職化特徵各變項的潛在調節效果檢定結果

調節變項	<i>k</i>	Intercept/mean <i>z</i> [95% CI]	β [95% CI]	<i>F</i> (<i>df</i> ₁ , <i>df</i> ₂) ^a	<i>p</i> ^b	Mean <i>r</i>
測量工具						
PQ/FRS	152	.187***[-0.122, 0.252]		1.228 (3, 226)	.300	.185
PI	3	.178* [-0.022, 0.243]	-.009 [-0.124, -0.106]			.176
TOPQS	15	.081 [-0.283, 0.088]	-.106 [-0.253, -0.041]			.081
其他工具	69	.095 [-0.021, 0.157]	-.092 [-0.207, -0.023]			.095
親職化類型						
不公平感	25	.287***[-0.205, 0.370]		5.163 (7, 222)	< .001	.279
情感性親職化	45	.144***[-0.069, 0.219]	-.143***[-0.218, -0.069]			.143
工具性親職化	39	.067 [-0.009, 0.142]	-.222***[-0.296, -0.147]			.067
聚焦父母的親職化	13	.102 [-0.014, 0.218]	-.185** [-0.131, -0.057]			.102

（續下頁）

表 4
親職化特徵各變項的潛在調節效果檢定結果 (續)

調節變項	<i>k</i>	Intercept/mean <i>z</i> [95% CI]	β [95% CI]	<i>F</i> (<i>df</i> ₁ , <i>df</i> ₂) ^a	<i>p</i> ^b	Mean <i>r</i>
聚焦手足的親職化	12	.073 [-0.047, 0.193]	-.214**[-0.346, -0.083]			.073
獲益感	14	.117* [-0.002, 0.232]	-.171**[-0.298, -0.044]			.116
總分	54	.151***[-0.076, 0.226]	-.137**[-0.231, -0.043]			.150
其他類型	28	.144* [-0.030, 0.259]	-.143* [-0.270, -0.016]			.143

註：*k* 為效果量數；mean *z* 是效果量 (Fisher's *z*)；CI 是置信區間； β 為估計回歸係數；*r* 為平均的積差相關數。

^a 模式中回歸係數 β 均採用多項檢定。

^b *p* 是多項檢定的值。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5
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的潛在調節效果檢定結果

調節變項	<i>k</i>	Intercept/mean <i>z</i> [95% CI]	β [95% CI]	<i>F</i> (<i>df</i> ₁ , <i>df</i> ₂) ^a	<i>p</i> ^b	Mean <i>r</i>
內化問題	77	.179***[0.120, 0.237]		3.419 (3, 226)	.018	.177
外化問題	48	.085* [0.017, 0.152]	-.094**[-0.152, -0.036]			.085
總分	66	.135***[0.072, 0.197]	-.044 [-0.106, -0.018]			.134
其他問題	39	.155***[0.078, 0.231]	-.024 [-0.096, -0.048]			.154

註：*k* 為效果量數；mean *z* 是效果量 (Fisher's *z*)；CI 是置信區間； β 為估計回歸係數；*r* 為平均的積差相關數。

^a 模式中回歸係數 β 均採用多項檢定。

^b *p* 是多項檢定的值。

* *p* < .05. *** *p* < .001.

4. 出版特徵

如表 6 所示，出版特徵各變項均未見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係中的顯著性調節效果（出版年份： $F(1, 228) = 0.290, p = .591$ ；出版狀態： $F(1, 228) = 2.552, p = .112$ ）。這意味著研究報告的出版年份、是否發表等出版狀態，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係無統計學意義上的影響。

表 6
出版特徵各變項的潛在調節效果檢定結果

調節變項	<i>k</i>	Intercept/mean <i>z</i> [95% CI]	β [95% CI]	<i>F</i> (<i>df</i> ₁ , <i>df</i> ₂) ^a	<i>p</i> ^b	Mean <i>r</i>
出版年份	230	.146*** [0.094, 0.197]	.002 [-0.006, 0.011]	0.290 (1, 228)	.591	—
出版狀態						
發表	157	.175*** [0.112, 0.238]		2.552 (1, 228)	.112	.173
未發表	73	.089* [0.004, 0.175]	-.086 [-0.192, 0.020]			.089

註：*k* 為效果量數；mean *z* 是效果量 (Fisher's *z*)；CI 是置信區間； β 為估計回歸係數；*r* 為平均的積差相關數。

^a 模式中回歸係數 β 均採用多項檢定。

^b *p* 是多項檢定的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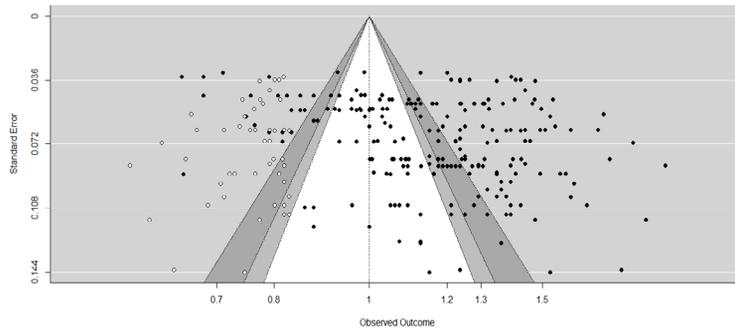
* *p* < .05. *** *p* < .001.

(三) 出版偏誤檢定

本研究首先採用傳統漏斗圖對出版偏誤進行初步評估，結果顯示數據點並未形成以整體估計的效果量為中心的對稱漏斗形。因此，進一步採用剪補法和剪補後輪廓增強漏斗圖對出版偏誤進行檢定。

經剪補法之後，結果表明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係之後設分析模式新增效果量個數為 48 個，剪補後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的整體效果仍顯著（95% CI [0.039, 0.097], $p < .001$ ）。接著，採用剪補後輪廓增強漏斗圖判斷這些增補效果量是否導致出版偏誤。如圖 2 所示，剪補後的效果量均分佈於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非白色區域，這說明親職化與心理健康關係的後設分析不存在出版偏誤，顯示後設分析的結果可靠。

圖 2
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相關效果量的剪補後輪廓增強漏斗圖



註：橫軸是轉化過的 Fisher's z 效果量，縱軸是該效果量的標準誤；黑色實心圓表示觀察到的原始效果量，白色空心圓表示剪補後填充的效果量；以中間垂直實線為起點從內到外的虛線分別限制 90%、95% 和 99% 的置信區間，白色部分表示無統計學意義區域。

（四）綜合討論

綜上，本研究後設分析的結果顯示親職化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之間具有顯著但低程度的正向關聯，並且文化脈絡、親職化類型、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等潛在變項對二者關係具有顯著性調節效果。以下擬從本研究採用的統計分析模式及相關結果分別討論如下：

1. 三層級後設分析模式

傳統後設分析模型假設各效果量之間相互獨立，因而在一個研究中只提取一個效果量。在面對包含多個效果量的研究時，傳統後設分析通常採取計算均值或者捨棄某些效果量的方式，這不免會導致數據的丟失；本研究採用的三層級後設分析模式則可以從一個研究中提取所有效果量，從而最大化保證數據的完整性，提高統計效率（Assink et al., 2015）。相較於傳統後設分析模型將變異來源分為抽樣變異（層級 1）和研究間變異，三層級後設分析模式則將研究間變異進一步分為研究內變異（層級 2）和研究間變異（層級 3），可以在數據分析過程中考慮同一研究中各個效果量之間的相關（Cheung, 2014）。本研究結果顯示，層級 2 與層級 3 的效果量變異顯著存在，這再次證明了採用三層級後設分析的必要性。

此外，層級 2 與層級 3 的變異佔總變異的 92.6%，這為後續的調節效果分析提供了前提。在本研究所選取的調節變項之中，樣本特徵與出版特徵因研究而異，更多地解釋不同研究間的效果量變異，可以將其暫時歸於層級 3 的調節變項；但親職化特徵與心理健康結果類別，既可能解釋研究內效果量變異（同一研究中不同親職化行為類型與不同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不同），又可能解釋研究間變異（不同研究所選取的親職化測量工具、行為類型與心理健康結果類別也不相同）。據此，本研究的調節效果分析只能同時分析各個調節變項在層級 2 與層級 3 的作用，未能分別對不同層級中各類調節變項的作用進行分析。有鑑於此，作為本研究重要突破之一的三層級後設分析模式，未來可持續改進並探索不同層級中各個調節變項的作用為何。此外，考慮到調節變項之間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在更多相關實證研究積累之後，可以將有關調節變項同時納入同一統計模型中進行考驗，藉以進一步探究影響親職化與心理健康關係的重要調節變項，從而獲得更為系統且具脈絡的實徵研究結果。

2. 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係

本研究三層級後設分析結果顯示，親職化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144 ($p < .001$)，屬於統計學上的小效果量 (Cohen, 1992)，這與 Hooper、Decoster 等人 (2011) 十年前的後設分析結果基本一致，且呼應西方家族治療學者認為，親職化對兒童或成人心理發展具有負向影響的假設。但值得注意的是，親職化與負向心理健康的相關程度較低，這可能有兩個面向的意涵。一方面，親職化作為童年逆境經歷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的一種，創傷強度明顯低於身體虐待、性虐待等經歷，其對兒童、青少年的心理發展的負向影響程度也較低；而且在親職化發生歷程中，諸如父母／外界的社會支持 (Tomeny et al., 2017)、孩子的自控能力 (Williams & Francis, 2010)、主體性 (張晨光、劉經偉, 2020)、情感自我揭露 (Murrin et al., 2021) 等變項也會調節其對心理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童年親職化有可能帶來正向的心理發展結果，如自我效能感 (Titzmann, 2012)、人際勝任力 (Champion et al., 2009; Kuperminc et al., 2009)、利社會行為 (侯季吟、蔡麗芳, 2013)，乃至於其成年後的自尊 (李董平等人, 2010)、復原力 (Yew et al., 2017)，或者同理心覺知 (van der Mijl & Vingerhoets, 2017) 等，從而緩衝或調節親職化對心理發展的負向影響。此結果提醒研究者在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做負向因果推論時應更為謹慎小心，換句話說，親職化對兒童、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影響就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van der Mijl & Vingerhoets, 2017)，可能產生「一種相對而絕非好壞的經驗」，亦即在承擔與束縛的過程中，也可能發展出自我韌性的辯證影響。

3. 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係的潛在調節變項

在本研究所選取之潛在調節變項中，文化脈絡、親職化類型、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等變項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具有顯著性調節效果；家庭脈絡的調節效果處於臨界顯著狀態；其他變項 (如性別、年齡段、測量工具、出版與否、出版年份等) 則不具顯著調節效果。

(1) 文化與家庭脈絡。本研究後設分析的結果顯示，相對於西方文化脈絡下研究所發現之親職化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的正相關 ($r = .192$)，來自於東方文化的研究所發現之二者相關關係 ($r = -.048$) 不但比較微弱，而且是負向相關。誠如一些學者所指出，在那些視兒童、青少年親職化為一種家庭生活常態或者文化價值所在的文化脈絡中，親職化對於心理發展的負面影響會被明顯削弱 (Williams, 2015)。相較於歐美的西方文化，華人文化強調傳統孝道與家族觀念，兒童、青少年在家中為父母分勞解憂、承擔家事、照顧手足等行為是被讚賞與鼓勵的 (吳嘉瑜、張盛堂, 2004)。在所謂的「自強兒童表揚活動」(張縉繆等人, 2018) 或者媒體報導中，親職化兒童、青少年常常被描繪為孝順、友愛、任勞任怨的正向積極的典範。這些來自社會或家庭系統的正向反饋與激勵，往往能夠增加兒童、青少年親職化的正向感受 (如角色滿意感、勝任感等)，進而緩衝親職化對心理發展的負向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翻轉親職化的負面影響。

至於土耳其、以色列等被編碼為「其他」的文化脈絡，相較於東、西方文化，並未發現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差異。由於土耳其橫跨歐亞兩個大洲，處於東西文化交匯處；而以色列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散居猶太人組成，文化多元。與特徵鮮明的東西方文化相比，這兩個國家的文化有點「介於中間」的意味，故而其文化脈絡下親職化的影響受文化影響的方向並不够明確、清晰。另一方面，「其他」文化脈絡下的研究較少，僅有 4 個效果量納入後設分析，也可能會影響統計分析的結果。

在研究取樣的脈絡方面，學者們普遍認同親職化更多地發生在那些面臨疾病困擾或生活壓力的家庭系統之中 (Williams, 2015)。諸如父母生理疾病 (Thastum et al., 2008)、精神疾病 (Godsall et al., 2004)、酒精成癮 (Carroll & Robinson, 2000)、移民 (Biedron, 2019) 等壓力源，不但損害父母的教養功能，還會因為維持家庭穩定的迫切需要而增加兒童、青少年所承擔的親職化強度，進而帶來負面的心理健康結果。因此，後設分析結果顯示臨床家庭脈絡中的孩子，其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高於常規家庭脈絡中的孩子。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後設分析所發現之家庭脈絡調節效果 ($p = .076$) 未達統計之顯著性，略高於統計要求之 .05。這可能與本研究「常規家庭脈絡」的編碼有關。在該編碼中，一部分研究受限於大規模取樣，因此並未將研究對象根據其家庭脈絡分別進行相關分析，亦不強調研究對象所處家庭脈絡的影響，故而編碼為「常規家庭脈絡」；另一部分聚焦於家庭中父母吵架時的兒童親職化，但父母爭吵是多數家庭都可能出現的狀況，不能因此歸

入「臨床」脈絡，故暫且將其編碼為「常規家庭脈絡」。對前者而言，其研究對象的家庭脈絡並不確定；對後者來講，兒童、青少年捲入父母爭吵時的親職化，會在家庭矛盾的脈絡中顯得更為隱蔽，父母因為夫妻關係困擾而無法給予孩子必要的正向反饋與情感支持，從而增加親職化負面影響孩子心理發展的可能性。

(2) 親職化類型。與 Hooper、Decoster 等人 (2011) 後設分析結果不同的是，本研究發現親職化類型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具有顯著性的調節效果，特別是在諸多親職化類型中，「感知到的不公平感」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係數顯著地高於其他親職化類型。所謂「感知到的不公平感」，與兒童、青少年所承擔的親職化任務強度、親職化任務在手足之間的分配情況、有無在家庭脈絡中獲得父母或手足的肯認與支持有關 (Jurkovic et al., 2001)。一方面，Jurkovic 等人 (2004) 主張不公平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親職化的結果是正向還是負向，甚至將其設定為「破壞性親職化」(destructive parentification) 的必要條件 (Jurkovic et al., 2001)；另一方面，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關係的研究 (Hooper, Decoster, et al., 2011; Thirkield, 2001) 也發現不公平感對心理健康的預測作用的確要高於親職化行為 (工具性／情感性親職化)。考慮到不公平感在親職化歷程中的獨特作用，一些研究者嘗試將不公平感作為親職化影響心理健康的中介變項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親職化角色行為通過其帶來的不公平感受而影響兒童、青少年的心理發展 (Jankowski et al., 2013)。相反，父母給予的情感支持可以顯著增進孩子 (高中職學生) 的主觀幸福感 (陳紅蓮、吳和堂, 2022)。從這種意義上講，兒童、青少年的親職化行為本身並不必然造成心理健康方面的負面影響，也許他們「並不畏懼辛苦，但怕的是付出得很辛苦卻又無法被肯定或被了解」的主觀感受，才是影響心理適應的關鍵所在 (黃宗堅等人, 2010)。

(3) 心理健康結果類別。與 Hooper、Decoster 等人 (2011) 的後設分析一致，本研究也發現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的潛在調節效果顯著。只是由於分類編碼方式的不同，本研究發現心理健康結果類別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更為寬泛的內化問題 (憂鬱、焦慮症狀等) 與外化問題 (物質使用、違紀等) 之間，換句話說，親職化與內化問題的相關顯著地高於其與外化問題的相關。依照依附理論的觀點，親職化會導致個人形成有關自己和他人的適應不良的內在工作模式——他人不是可靠的照顧來源，自己不值得收穫他人的照顧。加之親職化過度負荷的壓力、無法完成親職化任務的負疚感，都會給兒童、青少年帶來內化情緒問題 (如焦慮、憂鬱)，甚至會延續至成年之後。與此同時，由於親職化兒童在家庭中較能夠對家人表現出照顧、協助、關懷、瞭解、折衝等行為，那麼在家庭外的社群中也較能夠展現出分享、合作、協助與照顧等利社會行為 (侯季吟、蔡麗芳, 2013)。因此，與利社會行為相對立的外化問題行為，諸如違抗、攻擊性、違紀等社會化不足的表現，便會相應減少。上述結果也符合人們對親職化小孩標籤為「乖孩子」的印象，其行為多能符合社會規範的要求，但其內在卻因為需求常被忽略、自我價值低等問題而更容易經驗到諸多憂鬱或焦慮等內化問題。

(4) 其他不具有顯著調節效果的變項。首先，本研究發現「性別」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係中不具有顯著性的調節效果。雖然早期的一些親職化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在童年承擔更多的親職化責任並因此受到更多負面影響 (Stein et al., 1999)，但後續研究結果並未形成明確證據支持「親職化會因性別而有所不同」的觀點 (Williams, 2015)。曾有學者將這種結果歸因為研究對象的性別比例失衡 (Hooper, Decoster, et al., 2011) 或者親職化測量工具的題項差異 (McMahon & Luthar, 2007)，但本後設分析所納入的研究對象性別比例相對均衡 (女性佔比範圍介於 36.5% 至 72.0%)，且涉及到各種親職化測量工具，其結果再次證實親職化對心理健康結果的影響不存在性別差異。

其次，本研究結果顯示親職化測量工具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係中不具顯著性的調節效果。Hooper、Decoster 等人 (2011) 的研究雖然發現親職化測量工具的顯著性調節效果，但其後設分析納入的效果量較少 (使用 PQ 的研究效果量最多為 5 個，其餘工具均為 2 個)，且同時納入「訪談式」他評測量與「問卷式」自評測量。比較而言，本研究後設分析僅納入使用自評問卷進行親職化測量的研究，除 PI 以外，測量工具所涉及效果量均在 15 個以上，統計分析的效力較強。測量工具的調節效果不顯著，意味著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不受測量工具影響，換句話說，不同自評工具測量親職化的效果不存在顯著差異。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有關親職化之理論與實證研究，幾年來已成為家庭心理學家關切的焦點之一（Hooper, Decoster, et al., 2011）。為進一步探究「親職化對心理健康結果的影響究竟為何」，本研究統整 1984 年至 2021 年之中英文期刊論文及碩博士學位論文，共納入 51 項實證研究、230 個研究效果量，涉及 15,614 名研究參與者。本研究突破過去研究方法之限制，改採三層級後設分析模式進行統計分析後發現，親職化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調節效果的檢定結果顯示，研究對象所處之文化脈絡、親職化類型與心理健康結果類別均顯著地影響效果量。具體而言，來自於西方文化脈絡的研究對象，其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聯程度，顯著高於來自於東方文化脈絡的研究對象；親職化中主觀感知到的不公平感與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程度顯著高於其他親職化類型；親職化與內化問題行為的相關程度顯著高於其與外化問題行為的相關。此外，性別、年齡段、出版特徵等變項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結果之間不具顯著性調節效果。

(二) 建議

基於上述結論，本研究就家庭諮商實踐與親職化實證研究兩個面向提出以下建議：

1. 對心理諮商實踐的建議

由於受到早期家族治療理論的影響，一些實務工作者在家庭歷程的評估中使用親職化這個概念時，基本都秉持一種「病理」的觀點——「親職化是諸多形式的個體心理病理狀況的內在固有因素」（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然而，無論是 Hooper、Decoster 等人（2011）對童年親職化與成人心理病理結果的後設分析，還是本研究對親職化與心理健康更為全面性的後設分析，結果均顯示親職化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的相關程度僅為低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納入東方文化脈絡下的研究之後，本研究結果發現東方文化脈絡下的親職化與心理健康負向結果的關係顯著低於西方，相關係數僅為 $-.049$ 。易言之，東方文化脈絡下的研究所發現的親職化與負向心理健康結果的關係不但相當微弱，而且親職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緩衝負向心理健康症狀的出現。因為從西方家族治療的觀點來看，親職化乃是家庭分化或自我分化不良所導致的結果；但在華人家庭文化脈絡中，親職化的展現有時反而可以穩固並調節家庭需求，甚至是維持家庭系統等功能。上述現象提醒實務工作者在華人文化脈絡下面對具有親職化經驗的個案時，需要秉持文化價值的敏感性，對個案原生家庭歷程、親職化經驗進行更為全面的評估。唯有如此，方能避免片面依賴西方理論而對親職化採取「過度病理化」（overpathologization）的假設（Kuperminc et al., 2009）。

此外，本研究調節效果檢定的結果也再次提醒，實務工作者不但需要評估親職化的程度、持續時間之外（East & Weisner, 2009），更要區辯不同類型的親職化及其影響，尤其需要重視親職化行為背後，其主觀心理感受是否產生不公平感，才是造成適應問題的關鍵所在。基於對不公平感的研究，Jankowski 等人（2013）建議在實務工作中將不公平感視為一種「情緒創傷」（emotional injuries），借鑒情緒聚焦治療（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Greenberg et al., 2010）的做法解析（resolve）與不公平感有關的負向情緒。考慮到親職化常常伴隨的羞恥感（王聘，2013；Wells & Jones, 2000）會阻礙個案的負向情緒覺察與表達，因此實務工作需要增加個案對負向情緒的敏感覺察與表達的自主感（ownership），進而協助個案聚焦於過度壓抑的需求和擔憂，在此基礎上個案才有可能發生情緒轉化而非被不公平感所帶來的「憤怒」層層網綁住。

前述的東方文化脈絡，其實帶著一體兩面的雙重影響，一方面可能減少親職化小孩的不公平感而緩衝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卻有可能成為個案表達親職化不公平感的障礙。在以強調「孝道」的華人文化為例，雖然親職化行為有可能被視為孝道實踐而得到社會、父母的讚賞，但同

樣會將親職化行為視為「理所應當」而無法表達當中可能引發的不公平感，甚至憂心自己對家庭的付出不夠好、不夠多而產生羞愧情緒（簡匯育，2010），上述的現象，皆需要實務工作者更為細緻且耐心地緩解這些隱而未說感覺之外，亦可協助個案在照顧他人需求的同時，也能夠增進對自我的滋養與疼惜。

2.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基於後設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對親職化相關實證研究的建議如下：

(1) 隨著親職化理論與實證研究的不斷發展，一些研究開始探討親職化與正向心理結果（如共情能力、正向社會關係、復原力等）的關係。因此，建議未來後設分析納入正向心理健康結果的相關研究，以補充當前研究之不足。此外，考慮到本後設分析所納入的效果量中涉及 PI 者較少，這也許會影響「測量工具」調節效果的統計考驗。因此，有必要在使用 PI 的實證研究有所積累後，繼續通過後設分析探索親職化測量工具的調節效果。鑒於親職化影響心理健康相關的質性研究不斷增加，未來亦可使用質性後設分析的方法對相關質性研究進行分析，將會是對量化後設分析的重要補充。

(2) 有鑑於親職化中「不公平感」對心理健康結果的獨特作用，建議將以不公平感為代表的親職化心理感受作為獨立於親職化角色行為（如工具性／情感性親職化等）的構念，在編制或修訂親職化量表時考慮以二階模式來容納此兩類親職化表現，以避免如過去只是籠統地計算親職化總分，則很容易喪失此特殊構念所產生的獨特影響。

(3) 將文化脈絡變項納入研究，是目前親職化研究的趨勢所在。不過，若只是對不同文化脈絡（如東方、西方等）下研究對象的親職化及其影響進行比較，顯得有些籠統而淺薄。建議未來將文化變項（如個人／集體主義、雙元自主性、孝道信念等）作為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的調節變項進行檢定，在區辯親職化角色行為與心理感受的前提下，更為細緻地分析探討文化脈絡在親職化歷程中的影響。

(4) 考慮到家庭脈絡在本研究後設分析中的調節效果，但若只是將親職化籠統地歸因為家庭脈絡中父母功能的缺失似乎並不恰當，未來有必要將父母失功能的程度、孩子感知到的親職化迫切程度等因素設定為親職化的前置變項，探究不同家庭脈絡（父母／手足身心障礙、父母離異或爭吵、移民、經濟貧困等）中，其親職化發展歷程及其對心理適應的影響機制究竟為何。

參考文獻

- 王聃（2013）：《親職化對中學生羞恥感的影響》（未出版碩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Wang, D. (2013). *The impact of parentification on sham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王趙娜、王美萍（2014）：〈初中生親子三角關係與抑鬱：自尊的中介作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22，696–698。[Wang, Z.-N., & Wang, M.-P. (2014). Parent-child triangulation and depress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2, 696–698.]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14.04.029>
- 李方敏（2021）：《小學兒童親子三角關係、家庭功能與問題行為的關係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雲南師範大學。[Li, F.-M. (2021).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child triangulation, family func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27459/d.cnki.gynfc.2021.001252>
- 李汶軒（2013）：《家庭照顧者親職化經驗、照顧負荷與健康狀態之關係》（未出版碩士論文），淡江大學。[Lee, W.-H. (2013).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fied experience, caregiver burden,*

- and health status of family caregiver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Tamkang University.]
- 李董平、張衛、孫文強、邢文利、李霓霓、吳欣欣、金淼（2010）：〈兒童親職化與大學生心理發展的關係：一項回溯性研究〉。《心理科學》，33，639–642。[Li, D., Zhang, W., Sun, W., Xing, W., Li, N., Wu, X., & Jin, M. (2010).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undergraduate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 retrospective study. *Psychological Science*, 33, 639–642.] <https://doi.org/10.16719/j.cnki.1671-6981.2010.03.061>
- 吳嘉瑜、張盛堂（2004）：〈叫「好孩子」太沉重！？幼年具親職化經驗之性罪犯的人際特色及處遇〉。《中華團體心理治療》，10（2），19–27。[Wu, C.-Y., & Chang, S.-T. (2004). Jiao "haohaizi" tai chezhong!?! Younian ju qinzhihua jingyan zhi xingfanzui de renji tese zhi chuyu. *Chinese Group Psychotherapy*, 10(2), 19–27.] <https://doi.org/10.30060/CGP.200406.0005>
- 侯季吟、蔡麗芳（2013）：〈親職化蘊涵著正向力量？弱勢家庭子女親職化與利社會行為之相關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5（2），25–46。[Hou, C.-Y., & Tsai, L.-F. (2013). What are positive implications of parentifi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underprivileged family. *The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35(2), 25–46.]
- 張虹雯、郭麗安（2000）：〈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與兒童行為問題之相關研究〉。《中華輔導學報》，8，77–110。[Chang, H.-W., & Kuo, L.-A. (200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angle operation in parental quarrels and behavior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Annual Repor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8, 77–110.]
- 張晨光、劉經偉（2020）：〈親職化中的子女主體性：來自於「孝道」研究的啟示〉。《輔導與諮商學報》，42（2），63–82。[Zhang, C.-G., & Liu, J.-W. (2020). Children agency in parentification: Inspiration from studies of filial piety. *The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42(2), 63–82.]
- 張縉鏐、蘇映伊、王聖基（2018）：〈台灣貧困家庭親職化兒童的生活樣貌與需求〉。《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8（2），43–86。[Chang, M.-L., Su, I.-I., & Wang, S.-C. (2018). The situation and needs of the parentified children in the needy families in Taiwan.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8(2), 43–86.] <https://doi.org/10.3966/222372402018100802002>
- 陳紅蓮、吳和堂（2022）：〈高中職學生的父母親情感支持、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之關係：中介效果的分析〉。《教育心理學報》，53，565–586。[Chen, H.-L., & Wu, H.-T. (2022).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3, 565–586.] [https://doi.org/10.6251/BEP.202203_53\(3\).0003](https://doi.org/10.6251/BEP.202203_53(3).0003)
- 陳景花、余民寧（2019）：〈正向心理學介入對幸福與憂鬱效果之後設分析〉。《教育心理學報》，50，551–586。[Chen, J.-H., & Yu, M.-N. (2019). Effec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on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0, 551–586.] [https://doi.org/10.6251/BEP.201906_50\(4\).0001](https://doi.org/10.6251/BEP.201906_50(4).0001)
- 陳慧珊、吳麗娟（2013）：〈大學生親職化現象、個體化程度與身心健康指標之相關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5，103–120。[Chen, H.-S., & Wu, L.-C. (2013).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 parentification, individuation, and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5, 103–120.] <https://doi.org/10.6251/BEP.20130121>
- 郭笑笑、高雯、董成文、夏麗帕（2021）：〈兩類親職化在父母衝突與青少年問題行為之間的不同作用〉。《心理技術與應用》，9，170–179。[Guo, X., Gao, W., Dong, C., & Xialipn, A. (2021). Different roles of two kinds of parentifi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Psycholog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9, 170–179.] <https://doi.org/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3.006>
- 許惠雯（2007）：《從親子三角關係、情緒安全感探討兒童知覺父母衝突與其適應之關係》（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Hsu, W.-W. (2007). *Cong qinzi Sanjiao guanxi, qingxu anquangan tantao ertung zhijue fumu chongtu yu qi shiying zhi guanxi*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黃宗堅、李佳儒、張勻銘（2010）：〈代間關係中親職化經驗之發展與自我轉化：以成年初期女性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33，59–106。[Huang, T.-C., Li, J.-R., & Chang, Y.-M. (2010). Parentification 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 study of women in early adulthood.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33, 59–106.] <https://doi.org/10.6254/2010.33.59>
- 楊陽（2011）：《親子三角關係在初中生知覺父母婚姻衝突與心理健康間的中介作用》（未出版碩士論文），河南大學。[Yang, Y. (2011). *Qinzi sanjiao guanxi zai chuzhongsheng zhijue fumu hunyin chongtu yu xinli jiankang jian de zhongjie zuoyong*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enan University.]
- 簡匯育（2010）：《高中職生親職化量表編製與其復原力、身心健康之探討》（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Chien, H.-Y. (2010). *A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parentification scale for senior high and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fication, resilience, and general health*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braham, K. M. (2010). *When mom has a serious mental illness: The mother-young adult relationship, caregiving,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 Achenbach, T. M. (1966).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ldren's psychiatric symptoms: A factor-analytic stud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80(7), 1–37. <https://doi.org/10.1037/h0093906>
- Achenbach, T. M., Ivanova, M. Y., Rescorla, L. A., Turner, L. V., & Althoff, R. R. (2016). Internalizing/Externalizing problems: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linical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55(8), 647–656. <https://doi.org/10.1016/j.jaac.2016.05.012>
- Assink, M., van der Put, C. E., Hoeve, M., de Vries, S. L. A., Stams, G. J. J. M., & Oort, F. J. (2015). Risk factors for persistent delinquent behavior among juvenil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42, 47–61. <https://doi.org/10.1016/j.cpr.2015.08.002>

- Assink, M., & Wibbelink, C. J. (2016). Fitting three-level meta-analytic models in R: A step-by-step tutorial.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Psychology, 12*(3), 154–174. <https://doi.org/10.20982/tqmp.12.3.p154>
- Biedron, K. (2019). *Acculturation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immigrant mental healt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dler University.
- Borchet, J., Lewandowska-Walter, A., Połomski, P., & Peplińska, A. (2020). Construction of a par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for youth. *Health Psychology Report, 8*(2), 175–188. <https://doi.org/10.5114/hpr.2019.89492>
- Borchet, J., Lewandowska-Walter, A., Połomski, P., Peplińska, A., & Hooper, L. M. (2020). We are in this together: Retrospective parentification,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9*(10), 2982–2991.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20-01723-3>
- Borenstein, M., Hedges, L. V., Higgins, J. P. T., & Rothstein, H. R. (2009). *Introduction to meta-analysis*. John Wiley & Sons.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743386>
- Boszormenyi-Nagy, I., & Spark, G. M. (1973). *Invisible loyalties: Reciproc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herapy*. Harper and Row.
- Bowen, M. (1976).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In M. Bowen (Ed.),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pp. 337–387). Jason Aronson.
- Burton, L. (2007). Childhood adultification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 conceptual model. *Family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Applied Family Science, 56*(4), 329–345.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07.00463.x>
- Burton, S., Hooper, L. M., Tomek, S., Cauley, B., Washington, A., & Pössel, P. (2018).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arentificat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behavior and well-be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arly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7*(12), 4044–4059.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8-1215-0>
- Byng-Hall, J. (2008). The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 fulfilling parental roles: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therapy.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0*(2), 147–162.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27.2008.00423.x>
- Carroll, J. J., & Robinson, B. E. (2000). Depression and parentification among adults as related to parental workaholism and alcoholism. *The Family Journal, 8*(4), 360–367. <https://doi.org/10.1177/1066480700084005>
- Castro, D. M., Jones, R. A., & Mirsalimi, H. (2004). Parentification and the impostor phenomen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2*(3), 205–216. <https://doi.org/10.1080/01926180490425676>
- Champion, J. E., Jaser, S. S., Reeslund, K. L., Simmons, L., Potts, J. E., Shears, A. R., & Compas, B. E. (2009). Caretaking behaviors by adolescent children of mothers with and without a history of depr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2), 156–166. <https://doi.org/10.1037/a0014978>
- Chase, N. D. (1999). Parentification: An overview of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etal issues. In N. D. Chase (Ed.), *Burdened children: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parentification* (pp. 3–33). SAGE Publications.

- Chase, N. D., Deming, M. P., & Wells, M. C. (1998). Parentification, parental alcoholism, and academic status among young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6*(2), 105–114.
<https://doi.org/10.1080/01926189808251091>
- Chen, C. Y. C., & Panebianco, A. (2020).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parental chronic illness, parentification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sychology & Health, 35*(9), 1075–1094.
<https://doi.org/10.1080/08870446.2019.1699091>
- Cheung, M. W. L. (2014). Modeling dependent effect sizes with three-level meta-analys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Psychological Methods, 19*(2), 211–229.
<https://doi.org/10.1037/a0032968>
- Cho, A., & Lee, S. (2019). Exploring effects of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on adult-depressive symptoms in Korea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5*(4), 801–813.
<https://doi.org/10.1002/jclp.22737>
- Cohen, J. (1992). A power prime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1), 155–159.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2.1.155>
- Diaz, N., Siskowski, C., & Connors, L. (2007). Latino young caregiv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they and what are the academic implications of this role?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36*(4), 131–140.
<https://doi.org/10.1007/s10566-007-9040-4>
- Duval, S., & Tweedie, R. (2000). Trim and fill: A simple funnel-plot-based method of testing and adjusting for publication bias in meta-analysis. *Biometrics, 56*(2), 455–463. <https://doi.org/10.1111/j.0006-341x.2000.00455.x>
- East, P. L. (2010). Children’s provision of family caregiving: Benefit or burden?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4*(1), 55–61. <https://doi.org/10.1111/j.1750-8606.2009.00118.x>
- East, P. L., & Weisner, T. S. (2009). Mexican adolescents’ family caregiving: Selection effects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with adjustment. *Family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Applied Family Science, 58*(5), 562–577.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09.00575.x>
- Godsall, R. E., Jurkovic, G. J., Emshoff, J., Anderson, L., & Stanwyck, D. (2004). Why some kids do well in bad situations: Relation of parental alcohol misuse and parentification to children’s self-concept. *Substance Use & Misuse, 39*(5), 789–809. <https://doi.org/10.1081/JA-120034016>
- Greenberg, L., Warwar, S., & Malcolm, W. (2010). Emotion-focused couples therap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forgivenes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6*(1), 28–42. <https://doi.org/10.1111/j.1752-0606.2009.00185.x>
- Hamin, D. A. (2006). *Filial responsibility as a moderator of witness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in Latino childre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57709/1061200>
- Hooper, L. M., Decoster, J., White, N., & Voltz, M. L. (2011). Characteriz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reported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adult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7*(10), 1028–1043. <https://doi.org/10.1002/jclp.20807>

- Hooper, L. M., & Doehler, K. (2012). Assessing family caregiving: A comparison of three retrospective parentification measure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8*(4), 653–666. <https://doi.org/10.1111/j.1752-0606.2011.00258.x>
- Hooper, L. M., Doehler, K., Jankowski, P. J., & Tomek, S. E. (2012). Patterns of self-reported alcohol us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body mass index in a family sample: The buffering effects of parentification. *The Family Journal, 20*(2), 164–178. <https://doi.org/10.1177/1066480711435320>
- Hooper, L. M., Doehler, K., Wallace, S. A., & Hannah, N. J. (2011). The Parentification Inventory: Development, validation, and cross-valid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9*(3), 226–241. <https://doi.org/10.1080/01926187.2010.531652>
- Hooper, L. M., Tomek, S., Bond, J. M., & Reif, M. S. (2015). Race/ethnicity, gender, par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Comparisons among a nationwide university sample. *The Family Journal, 23*(1), 33–48. <https://doi.org/10.1177/1066480714547187>
- Hooper, L. M., & Wallace, S. A. (2010). Evaluating the par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psychopathology correlates.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32*(1), 52–68. <https://doi.org/10.1007/s10591-009-9103-9>
- Jankowski, P. J., & Hooper, L. M. (2012).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 validation study of the Bowen theory construct. *Couple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 226–243. <https://doi.org/10.1037/a0027469>
- Jankowski, P. J., Hooper, L. M., Sandage, S. J., & Hannah, N. J. (2013).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symptoms: Mediator effects of perceived unfair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5*(1), 43–65.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27.2011.00574.x>
- Jurkovic, G. J. (1997). *Lost childhoods: The plight of the parentified child*. Brunner/Mazel.
- Jurkovic, G. J., Kuperminc, G., Perilla, J., Murphy, A., Ibañez, G., & Casey, S. (2004). Ecologic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on filial responsibility: Implications for primary prevention with immigrant Latino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25*(1), 81–104. <https://doi.org/10.1023/B:JOPP.0000039940.99463.eb>
- Jurkovic, G. J., Morrell, R., & Casey, S. (2001). Parentification in the lives of high-profile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ies: A hidden source of strength and distress. In B. E. Robinson & N. D. Chase (Eds.), *High-performing familie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linical solutions* (pp. 92–113).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 Jurkovic, G. J., & Thirkield, A. (1998). *Par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 Jurkovic, G. J., & Thirkield, A. (1999). *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Adult (FRS-A)* [Database record]. APA PsycTests. <https://doi.org/10.1037/t17803-000>
- Kam, J. A. (2011).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brokering frequency and feelings on Mexican-Heritage youth's mental health and risky behavior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3), 455–475.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2011.01552.x>

- Kerig, P. K. (2005). Revisiting the construct of boundary dissolution: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5*(2-3), 5–42. https://doi.org/10.1300/J135v05n02_02
- Khafi, T. Y., Yates, T. M., & Luthar, S. S. (2014). Ethnic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al significance of parentification. *Family Process, 53*(2), 267–287. <https://doi.org/10.1111/famp.12072>
- Klassen, R. M., Tze, V. M. C., & Hannok, W. (2013). Internalizing problems of adul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6*(4), 317–327. <https://doi.org/10.1177/0022219411422260>
- Knapp, G., & Hartung, J. (2003). Improved tests for a random effects meta-regression with a single covariate. *Statistics in Medicine, 22*(17), 2693–2710. <https://doi.org/10.1002/sim.1482>
- Kuperminc, G. P., Jurkovic, G. J., & Casey, S. (2009). Relation of filial responsibility to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adjustment of Latino adolescents from immigrant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1), 14–22. <https://doi.org/10.1037/a0014064>
- Kuppens, S., Laurent, L., Heyvaert, M., & Onghena, P. (2013).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relational agg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ultilevel and sequential meta-analysi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9), 1697–1712. <https://doi.org/10.1037/a0030740>
- Louise, E., & Cushway, D. (2002). The parentified child.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7*(2), 163–178. <https://doi.org/10.1177/1359104502007002005>
- Lutz, M. C., Kok, R., Verveer, I., Malbec, M., Koot, S., van Lier, P. A. C., & Franken, I. H. A. (2021). Diminished error-related negativity and error positivity in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disorders: A meta-analysis on error processing.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 46*(6), E615–E627. <https://doi.org/10.1503/jpn.200031>
- Macfie, J., Brumariu, L. E., & Lyons-Ruth, K. (2015). Parent–child role-confus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an emerging concept. *Developmental Review, 36*, 34–57. <https://doi.org/10.1016/j.dr.2015.01.002>
- McMahon, T. J., & Luthar, S. S. (2007).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caretaking burden among children living in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7*(2), 267–281. <https://doi.org/10.1037/0002-9432.77.2.267>
- Mika, P., Bergner, R., & Baum, M. C.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a scale for assessment of parentification. *Family Therapy, 14*(3), 229–235.
- Miller, P. A., & Eisenberg, N. (1988). The relation of empathy to aggressive and externalizing/antisoci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3), 324–34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03.3.324>
- Minuchin, S., Montalvo, B., Guerney, B. G., Jr., Rosman, B. L., & Schumer, F. (1967). *Families of the slums: An exploration of their structure and treatment*. Basic Books.
- Moher, D., Liberati, A., Tetzlaff, J., Altman, D. G., & The PRISMA Group. (2009).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The PRISMA statement. *PLoS Medicine, 6*(7), Article e100009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0097>
- Morris, M. G., & Gould, R. W. (1963). Role reversal: A necessary concept in dealing with battered child synd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33*(2), 298–299.

- Murrin, M., Beffel, J. H., & Nuttall, A. K. (202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disclosure among typically developing siblings of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ournal of Child Family Studies*, 30(2), 364–374.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20-01846-7>
- Nakagawa, S., & Santos, E. S. (2012).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advances in biological meta-analysis. *Evolutionary Ecology*, 26(5), 1253–1274. <https://doi.org/10.1007/s10682-012-9555-5>
- Nuttall, A. K., & Valentino, K. (2016). An ecological-transactional model of generational boundary dissolution across development.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3(2), 105–150. <https://doi.org/10.1080/01494929.2016.1178203>
- Nuttall, A. K., Zhang, Q., Valentino, K., & Borkowski, J. G. (2019). Intergenerational risk of parentification and infantilization to externalizing moderated by child tempera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Family*, 81(3), 648–661. <https://doi.org/10.1111/jomf.12562>
- Oznobishin, O., & Kurman, J. (2009). Parent-child role reversa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mong immigrant youth in Israe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3), 405–415. <https://doi.org/10.1037/a0015811>
- Peters, J. L., Sutton, A. J., Jones, D. R., Abrams, K. R., & Rushton, L. (2008). Contour-enhanced meta-analysis funnel plots help distinguish publication bias from other causes of asymmetry. *Journal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61(10), 991–996. <https://doi.org/10.1016/j.jclinepi.2007.11.010>
- Schier, K., Herke, M., Nickel, R., Egle, U. T., & Hardt, J. (2015). Long-term sequelae of emotional parentification: A cross-validation study using sequences of regression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5), 1307–1321.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4-9938-z>
- Schwartz-Stav, O. (2019). *Strive for merger: A self-psychology and attachment perspective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ole confus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ifa.
- Shortt, J. W., Stoolmiller, M., Smith-Shine, J. N., Mark Eddy, J., & Sheeber, L. (2010). Maternal emotion coaching, adolescent anger regulation, and siblings' externalizing symptom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1(7), 799–808.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09.02207.x>
- Stein, J. A., Riedel, M., & Rotheram-Borus, M. J. (1999). Parentification and its impact on adolescent children of parents with AIDS. *Family Process*, 38(2), 193–208.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1999.00193.x>
- Thastum, M., Johansen, M. B., Gubba, L., Olesen, L. B., & Romer, G. (2008). Cop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qualitative exploratory study of children of parents with cancer.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3(1), 123–138. <https://doi.org/10.1177/1359104507086345>
- Thirkield, A. L. C. (2001). *The role of fairness in emotional and social outcomes of childhood filial responsibil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 Titzmann, P. F. (2012). Growing up too soon? Parentification among immigrant and native adolescents in German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1(7), 880–893.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1-9711-1>
- Tomeny, T. S., Barry, T. D., & Fair, E. C. (2017). Parentification of adult siblings of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 spectrum disorder: Distress, sibling relationship attitudes, and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42(4), 320–331.
<https://doi.org/10.3109/13668250.2016.1248376>
- van der Mijl, R. C. W., & Vingerhoets, A. J. J. M. (2017).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arentific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among students. *Psihologijske Teme*, 26(2), 417–430.
<https://doi.org/10.31820/pt.26.2.8>
- Vazsonyi, A. T., Mikuška, J., & Kelley, E. L. (2017). It's time: A meta-analysis on the self-control-deviance link.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8, 48–63. <https://doi.org/10.1016/j.jcrimjus.2016.10.001>
- Wells, M., & Jones, R. (2000).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shame-prone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8(1), 19–27. <https://doi.org/10.1080/019261800261789>
- Williams, K. (2015). *Risk and resilience in emerging adults with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ndsor.
- Williams, K., & Francis, S. E. (2010). Par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Locus of control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32(3), 231–237.
<https://doi.org/10.1007/s10591-010-9123-5>
- Yan, F., Zhang, Q., Ran, G., Li, S., & Niu, X. (2020).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problem behaviours in youths: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12, Article 104900. <https://doi.org/10.1016/j.chilyouth.2020.104900>
- Yew, W. P., Siau, C. S., & Kwong, S. F. (2017). Parentification and resilience among students with clinical and nonclinical aspirations: A cross-sectional quant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45(1), 66–75. <https://doi.org/10.1002/jmcd.12063>
- Zencir, T., & Haskan-Avci, Ö. (2019). Development of the parentified child scale-adult version: A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y. *Çukurova Üniversitesi Eğitim Fakültesi Dergisi*, 48(1), 531–553.
<https://doi.org/10.14812/cufej.443707>

收稿日期：2022 年 07 月 06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2 年 07 月 14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2 年 11 月 04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2 年 12 月 02 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1 月 09 日
五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1 月 16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3 年 01 月 16 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3, 55(1), 75–102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 O. C.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Chen-Guang Zhang¹, Tsung-Chain Huang², and Shu-Yu Liu²

Since its introduction by Boszormenyi-Nagy and Spark (1973) in the 1970s, parentification has become a ubiquitous topic in the fields of family therapy and family psychology. In empirical research, parentification is regarded as a risk factor threatening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Nuttall et al., 2019). However, some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e absence of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aladaptive mental health outcomes (Hamin, 2006; Hsu, 2007), whereas other studies have reveal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nstructs (Li, 2021; Chang & Kuo, 2000).

To determine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t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adult mental health, Hooper, Decoster, et al. (2011)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reported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adult psychopathology. Their result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reported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adult psychopat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depression, substance use, anxiety,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eating disorders, althoug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small. However, although they used various methods to collect relevant studies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1984 to 2010, they included only 12 empirical studies and 12 effect sizes in their meta-analysis. Among all moderators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ey focused on parentification type (emotional parentification and undifferentiated parentification) and ethnicity (White Americans and Black Americans). Given the universality of parent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adopting psychopathology as the only outcome variable may hinder the inclusion of studies in meta-analyses and reduce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meta-analytical results. Over the past decade, many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worldwide on parentification. Researchers in relevant fields have comprehensively explored the types, measurements, and research participants of parentification. Particularly, many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parentification in China.

In this study, we collected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rticles on parentification and used a three-level meta-analytic model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aladaptive mental health.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moderators that affect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aladaptive mental health to obtain further insights into this topic.

We searched the following computerized databases from their inception until December 2021: Index to Taiw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System,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PubMed, Wiley Online Library, ProQuest, EBSCO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and PsycArticles. From these databases, we identified Chinese and English articles whose titles or abstracts paired terms related to parentification (parentif* or role reverse or role conflict or boundary resolution or boundary disorder or boundary problems or young care*) with terms related

¹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¹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²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Tsung-Chain Huang,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mail: tchuang@cc.ncue.edu.tw

to mental health (mental health or internaliz* or depressi* or anxi* or somatization or distress). Using this search strategy, we identified a total of 1,081 potential articles for our meta-analysis. After excluding duplicates, we obtained 621 articles. After reading the titles and abstracts of these articles, we further excluded studies with unrelated themes (409 articles), theoretical studies (28 articles), and qualitative studies (76 articles). Finally, after reading the full texts of these articles, we excluded 57 articles, including studies with repeated samples (3 articles), studies with incomplete statistical data (24 articles), studies with other evaluation criteria (8 articles), and studies whose statistical results could not be converted into product erro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22 articles). Ultimately, a total of 51 journal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12 Chinese and 39 English) meeting the data selection criteria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In this meta-analysis, studies are primarily co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sample characteristics (e.g., gender, age group, family context, cultural context), publishing characteristics (e.g., published or unpublished and year of publication), paren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e.g., parentification type and measurements),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e.g., internalized and externalize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this study, two coders (the first and third authors) independently coded the included studies. To eliminate the effect of selection bias on the results of the meta-analysis, inconsistencies were resolved through discussion with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Ultimately, a total of 230 independent effect sizes were obtained from 51 studies. Before conducting the meta-analysis, eac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transformed into a normally distributed Fisher's z value. After the analysis, these z values were converted back into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The R software (version 4.1.1; 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Vienna, Austria)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aladaptive mental health outcome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A significantly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aladaptive mental health outcomes ($r = .144$). Random sampling variation (Level 1), within-study effect size variation (Level 2), and between-study effect size variation (Level 3) accounted for 7.381%, 34.538%, and 58.081%, respectively, of the overall effect size variations,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bserved between Level 2 and Level 3 ($p < .001$).

(2) Family context had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aladaptive mental health outcomes ($p = .076$). Specifical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a clinical family context (i.e., parents or siblings with long-term and chronic physical and mental diseases at home; $r = .229$) than among those with a normal family context ($r = .104$). Cultural context also exerted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p < .001$). Specifical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r = -.048$) in studies on the eastern culture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in studies on the western culture ($r = .192$).

(3) Parenting type had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p < .001$). Specifical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unfairness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r = .279$)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between other types of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r = .067$ to $.150$).

(4) Different mental health outcomes had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p = .018$). Among these outcome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r = .177$)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r = .085$).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outcomes (e.g., total score and other problems) did not vary significantly from that of internalization.

(5)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was observed for other potential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ge, measurements, publication year, and publication status.

Given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clinicians should not only evaluate the degree and duration of parentification (East & Weisner, 2009) but also differentiate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types and their effect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of parentification-related unfairness. To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family history and parentification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sensitivity of cultural values must be maintained. This approach is the important feasible means for avoiding the hypothesis of "overpathologization" based on western theories (Kuperminc et al., 2009). Empirical research on parentification should consider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parentification represented by perceived unfairness as a construct independent of the behavior of parentification (e.g., instrumental or emotional parentification). It should also utilize a second-order model to include the two types of parentification while developing or revising parentification scales. Relevant variables such as family and cultural contexts should be included

to examine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parentification in more detail.

In this study, we addresse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eta-analyses and used a three-level meta-analytical model to examine empirical research on parentific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meta-analysis may serve as systematic evidence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is field.

Keywords: parentification, mental health, three level meta-analysis, moderating effect